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PV.2208

10 April 197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六届特别会议

大会

第2208次全体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星期三上午十时三十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贝尼特斯先生

(厄瓜多尔)

——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7〕

——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胡阿里·布迈丁先生阁下讲话

——维尼斯先生(阿根廷)发言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厅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P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一日分发的,所以提出更正的时限为一九七四年四月十六日。

盼望各国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74-70507/A

议程项目7

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

主席：今天早晨大会开始审议议程项目7。

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胡阿里·布迈丁先生阁下讲话

主席：我十分荣幸地宣布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胡阿里·布迈丁先生阁下将向我们讲话。

请首席礼宾官费神陪同主席和秘书长到会堂来。

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布迈丁主席阁下被迎至大会会堂。

主席：我荣幸地代表大会欢迎并介绍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胡阿里·布迈丁先生阁下。

现在请布迈丁主席向大会讲话。

布迈丁主席：

今天我们聚集一堂，举行特别会议，这是国际关系中现有紧张局势日益恶化的直接结果。因此，这个会议的重要性和范围是不言而喻的。阿尔及利亚倡议召开这个大会，反映了另外一个会议所庄严表示的种种关切，那个会议可以被认为是标志着国际关系中决定性的转折点。我指的是去年九月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第四届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

我们的大会证明：全世界都普遍具有这些关切，而最近的事件已经使这些关切显得更严重和更鲜明。

在着手讨论我们这个会议所要研究的明确问题之前，为了认清我们的工作的真正意义，最好回顾一下不结盟国家首脑们所同意的基本结论。

不结盟国家在举行它们的史无前例的会议时，已经能用具体的决定和行动方案来表达它们的人民的愿望。因此，它们已经使世界大家庭注意到：它们所代表的人民，因为严重焦虑的阴影笼罩着他们实现希望的绝好机会，所以具有新的认识。

这个会议的全部分量，可以用与会者的人数和盛名来作判断，在这个会议里，现在支配国际关系的制度引起了争论；通常强加于极大多数人民的消极角色也被人唾弃。基于保证第三世界在处理国际事务中能起应有的作用的明确决定，这个会议使不结盟有了一股新的冲劲。

不结盟的存在理由，是保卫正义事业，反抗任何和一切形式的政治霸权及经济统制。不结盟的最主要目的是通过基于国家平等、尊重主权以及建立全世界公正和平的的国际合作，实现全人类的解放。

第四届不结盟国家会议曾经注意到，大国近年来曾经举行过一些令人瞩目的会

议，宣布国际关系中的重大改变。 一直努力要用和平共处和国际合作的益处来代替对抗的危險的不结盟国家已经对这些倡议的肯定方面的真正价值作了评价。

可是，极明显的，这些倡议在基本上符合发达国家的种种目的；这些国家正急于找寻一个共同立场以便解决迄今使它们分歧的严重争论，并且也急于建立足以调合其各别利益的合作关系。 我们必须注意，在逐渐脱离冷战关系的同时，第三世界的国家的情况并无相应的改进。

与此相反，紧张和战争已经转移到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而这些地方已经成为我们当代世界所有矛盾集在一起和更其恶化的地区。

会议鉴于这一点曾经强调急需促成第三世界各地区内和平和合作区域的建立，因为大国间的竞争越来越转移到第三世界地区，而且该地区人民的安全特别受到威胁。

对第三世界国家而言，国际安全问题只有从人民解放和尊重国家独立的角度才能加以处理。

鉴于下面的事实，这些考虑就特别使人信服，事实是独立国家的增多不但没有使所有国家公平地分担国际活动责任，却反而使决策权更加集中在一小撮国家的手中，同时，重新分割世界的危险已经开始再度出现。 由此可见，帝国主义的目标似乎比真正民主化的必要条件更其重要了。

因此而发展出来的惯例剥夺了各国际机关的真正大权，并使它们不为所有国家服务，转而侍候由少数在处理主要国际问题上享有独断权力的发达国家组成的俱乐部。

在这点上，裁军问题的讨论就是这种用完全是为了改组大国权力关系而结盟的办法，对全体人类都关切的种种问题作有限处理的一个例子。

特别在这一方面，不结盟国家为了保证全世界真正安全的条件，要通过世界性会议，实现全面彻底裁军——这种裁军不仅意味着禁止核试验及销毁贮存的核武器，并且也意味着拆除军事基地和撤回驻在世界所有地区的外国军队。

今天支配国际关系的是解放力量同进行统制和剥削的国家针锋相对的一种多方面的世界性的对抗，这些国家事实上每当它们的特权受到反对时就对新近独立的国家重新给予威胁。这样一来，在目前世界局势中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第三世界各区域内，紧张点越来越多，新冲突也有增无已。

在受到旷日持久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严重煎熬的越南，停止冲突的协定的执行继续受到新策略的阻碍，这些策略的目的是用其他方法夺回越南爱国人民在他们的斗争中取得的成果。不结盟国家会议已经重新声明它支援南越人民的惟一真正代表，南越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努力。

在同一区域内，柬埔寨人民表现出同样拒绝对帝国主义阴谋屈服的精神，而且他们现正进行的斗争证明第三世界的国家继续做他们自己命运的主宰的意志。这个斗争在不结盟国家会议上得到了支持，那个会议恢复了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元首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作为柬埔寨合法政府的权利。

这些侵略战争最要不得的是使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还能苟延残喘。第四届不结盟国家会议特别注意了对于以百万计的人命和第三世界一切人民的尊严都有影响的这种触目惊心的情况。会议通过了关于民族解放斗争的一项特别宣言并且有力地宣布不结盟国家决心动员一切可能有的资源去支援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解放。

现在时机已到，整个国际大家庭应该负担起它在这方面的责任，要超过只作形式上的谴责，并要在实际上着手执行目的在清除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的无数联合国决议。任何其他的态度简直就是放弃职权，等于同坚持使用暴力以维持统治制度的政权彻底勾结，而这种统治制度的卑鄙可耻的特性使支持或容忍它的人受到指摘。

在这方面，几内亚（比绍）的宣布独立是一大胜利，使一切民族解放运动都受到鼓励，也是它多方努力的铁证。我们必须给予支持并同它团结一致，特别是通过承认这个新国家的政府和让它加入联合国的办法。

自从第四届不结盟国家会议以来，发生了两个极端严重的事件，一件发生在南美，另一件发生在中东，二者都是帝国主义作法的明证；它们证实第三世界对于笼罩着它的安全和独立的永远危险的忧惧；并证明这种忧惧确有理由。

智利是多国公司炮制的帝国主义阴谋的悲惨场所，那个阴谋使那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归于毁灭，并使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遭受极凶恶的杀害，他给了世界一个遵从智利人民求取自由正义的志愿而牺牲自己专心努力的榜样。

关于中东，十月战争是犹太复国主义不断侵略吞并政策的必然结果，在这次战争之后，现在我们必须自问是否事实上已在采取走向这个问题的确定解决的步骤，也须自问是否帝国主义打算再次维持现状，并使世界面临新的既成事实。

但是抉择是明白的，不是走向持久的和平便是又采取权宜的、拖延的战术，走前一条路，正如不结盟国家会议所强调的，就要撤出一切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并让巴勒斯坦人民恢复他们的民族权利，而走另一条路，就要再次牺牲人民的权利，推迟一切的解决和继续受辱和堕落。

这是明白的：第二条路是为进一步的战争打基础，其后果对国际和平及安全来说是特别可怕的，因为依照阿拉伯人民的志愿，尤其依照首当其冲，直接遭受犹太复国主义侵略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志愿。达到公正解决的远景将会造成了空虚的希望。

在我们选用几个显著例子描出了轮廓的这一背景之下，我们的辩论今天在这个大会里开始。这些例子因为已经由不结盟国家的元首仔细的研究过了，所以能够使我们看清楚我们讨论的问题，从而使我们对于我们现在面临的并且我们必须立即寻求适当解决办法的各项重要经济问题的性质范围和含义更能把握得住。

当人类以征服空间迎接七十年代，借着这项显赫的成就表明他在科学与技术上的能力足以匹敌大自然的最大难题的时候，人类对着困扰世界的匮乏和贫穷等戏剧性问题还是束手无策，不能解决。

发展问题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前已由国际大家庭把当作一项国际优先事项提了出来，今天已经成为我们大家必须面对的，不能再推迟的最优先的优先事项，倘若我们想要避免这问题有一天演变成为不可收拾的大悲剧。

任何真正向发展问题发动正面进攻的政治决心首先必须确认世界资源的分配是一个中心问题。换句话说，要对这个问题谋取具体和确定的解决办法，作为先决条件，应当对确认人类的优先要求采取适当的立场。这终必导致富国与穷国之间的经济关系的大改组，走向成长和进步的利益的分配，一种为了公平起见，必须符合有关各方的需要，优先要求以及合法利益的分配。

但是，我们必然首先要确认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世界经济完全操纵在一小撮高度发达国家的手里。凭着它们的统治地位，这一小撮按照它自己的优先要求次序，恣意决定世界资源的分配。由于这种情况，使有些国家愈来愈富而其他国家则陷于贫困的过程已被提升到某种普遍规律的地位。

图利以及紧紧抓住它们支配世界资源的地位的意志一向是世界上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行为的指导原则。在种种假托下，新老殖民主义的现象始终围绕着世界资源被强国盗用，致使弱国受害的问题。

实际上，殖民主义国家及帝国主义国家只在它们已经建立了用以继续殖民时代所树立的掠夺体制的机关和机构时才接受了民族自决权的原则。

由于发达国家对原料市场有实际的支配权，并对制成品和资本设备实际上有独占权，而同时他们享有资本和服务的垄断权，因而它们对于从发展中国家取得的原料价格以及向这些国家供应的货物和服务的价格，都能任意规定。因此，它们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耗竭第三世界的资源以满足它们本身的利益。

这就是我们今日所生活的世界的经济秩序的基础。在极大多数人类的心目中，这是一个同殖民秩序一样不合理和落伍的秩序，而殖民秩序其实就是它的根源和实质。因为这个经济秩序是依靠一个继续使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过程来维持、巩固和繁荣的，它对于第三世界一切国家获得发展和进步的任何希望都构成重大障碍。

为解决发展问题而作的各项倡议都遭到举世公认的失败，因为它们充其量只是治标的方法而不是具体的解决办法。

正如所构想的，发展援助是一种布施，分几个发展十年来供应，这是一项可笑的，何况更是从未完全实现的援助，因此，同另一种援助方式，即马绍尔计划形成了极鲜明的对照。

马绍尔计划的援助是在冷战时期所缔结的政治军事同盟范围内给予的，由一个发达国家为其他发达国家的利益而提供，十分之九是补助金，共占美利坚合众国国

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 这项援助办理得既充分又迅速，可见发达国家具有援助的政治意志，它们的资金财源很快便可以动员起来。

实际上，在最需要发展的国家中，发展一直进行得最慢。

重要的一点是：第四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注意到国际发展战略的失败，把这种失败主要归咎于富国缺乏政治意志，对发展中国家真正关切的问题缺乏认识以及国际经济合作上的各种欠缺不足。

现在是阐明这些问题，也是让每个人肩负起他自己的责任的时候了。

国际上，把发展行动置于斗争的辩证法之内，在国内首先并且最先依靠本身的力量和资源，这两点作为发展中国家唯一出路的两个主要构成部分，是愈来愈明显的了。

阿尔及利亚本身选择了这个途径，并毫不畏缩地坚持下去。作为民族解放斗争的延续而出现的阿尔及利亚今天所循的发展战略，是这个斗争具有最深刻意义的表现。

为了让国家和人民掌握民族经济的实际控制，阿尔及利亚人民在恢复他们的主权后，立即专心进行收复阿尔及利亚自然资源的庞大事业。

因此，我国采取了若干步骤：例如，采矿工业收归国有、土地亦收归国有、收回民族经济各基本部门的一切生产资料、对石油工业树立国家管制的一些决定，特别是只有国家当局才能确定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决定。

所有这些措施，连同教育的民主化，和农村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结构的改造，导致一种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国家全部能力的逐步动员。其目的在于加速发展的过程，并使之符合一个对每一个公民，都是以经济为手段，以社会和文化进步为目标的价值尺度。

我们的经验并非得自武断地制订的假定，也不是得自任何理论性的论据，而是受外国势力支配的民族的不幸境遇在历史上所得教训的结果。

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石油资源的开采，提炼和加工方面所取得的结果是经过我们多年坚持不断紧张努力和作出牺牲后才取得的。我们在达到目标以前所从事的种种斗争，一再使我们面临严重的困难和相当的危险，因此，今天使我们获得各种利益的结果，最重要的是阿尔及利亚人民所赢得的。他们已付出了代价，自当坚决保卫取得的利益。

很多工业国家，决不是其中的最小国家而已，目前对一些经济大国的霸权对它们的经济和独立所带来的危险表示关心。这些国家已开始采取步骤使自己当家作主。

至于第三世界，我们正生活在也坚持自己当家作主的原料生产国为利用自己的自然资源的利益从事本身发展，而进行了几次战斗的时代。但在这方面得到的最初的胜利立即令我们各国卷入解放斗争的一个新的和决定性的阶段。

因此，我们绝对不可不认清这样的事实：只要那些国际垄断企业和多家公司——这些过去精于为维护根本利益，而巧妙地作出让步的高手——继续控制把贫国财富搬走的种种伎俩，主要是确定原料价格的制度的话，完成收复权益的努力将无法实现。

因此，民族解放的艰苦道路上已隐现了新的战斗。

这场战斗是一直在进行的统治和掠夺的理论与解放和收复权益的理论两相对抗的最新表现。这场战斗所争夺的，无非是相同的终极目标：属于第三世界各国的资源成果的控制和使用。

在那严肃地号召所有第三世界原料生产国团结起来，保卫它们的原料价格的第四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之后，石油输出国家立即采取的行动是最符合发展中国家基本利益的。

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行动真正是第一个例证，同时也是最具体和最可观的例证，证明原料价格对我们各国十分重要，生产国十分需要掌握控制价格的杠杆和组织原料生产国联盟是十分可能的。

这样看来，发展中国家不应把这项行动看作一个问题——换句话说，不应站在那些希望分裂第三世界的人的立场去看——而应当作产生希望的实例和泉源。

事实是这样的：在石油生产国作出决定之后，应列于第三世界议程上的行动是扩展石油生产国所取得的成果，以便包括发展中国家出产的一切基本原料。不仅如此，由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各生产者组织里，在铜、铁矿、铝土矿、橡胶、咖啡、可可、花生和其他产品等方面已经出现有目共睹，万无一误的新力量的迹象，这样的扩展实际上已经开始——某些工业国在对石油表现的情绪的伪装下也恐惧的正是这种扩展。

然而，我们不应该因为发展中国家在有效收复本国自然资源方面逐渐展露上述充满希望的前途，而忽略了我们将来必定碰到的种种极端重大的障碍，因为每逢我们说明发展方面的真正问题的时候，总是遭遇到一贯拒绝的态度。

从二月份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议中，我们得到了这种态度的最近一次例证。

工业国家提出关于石油公平价格的若干论调，对于这种价格对它们的经济所谓有若干影响，也显出忧惧，但是，最使它们生气，并引起它们激烈反应的，不在于此，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有史以来，发展中国家第一次可以随意订定本国原料的价格。

在最高度发达的国家的的心目中这个先例会随之引起一种迫切的危险，就是一切原料和商品可能迅速普遍援例。于是，这些国家之中，有的便决心要求工业国家成立一个联盟，来对付产油国家，借以抵消这个先例。这个联盟的双重目标是牵制石油生产国家组织所属各国的行动，并使工业国家对生产原料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发挥劝阻的力量。

华盛顿会议的真正用意，与其说是表示国际合作的愿望，不如说是一种对抗的序幕。

目前处于发展过程中的国家，不论是否产油国家，其所遭遇的问题都一定极为繁多，一定极为严重，一定极为紧要，绝非石油在工业国家所能造成的任何问题可以比拟。一般来说，这些都是国际经济关系极不平衡的固有问题——这些问题在没有石油问题以前便老早发生，也是我们现在还面临的问题。

如果需要的是一次对话，我们也赞成对话，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这次对话必须建立在有关各方的优先事项平等看待的基础上：发达国家有自己的优先事项，发展中国家也有自己的优先事项，后者更加迫切，更加紧要。

因为上述种种理由，阿尔及利亚认为没有一个场所比联合国更适合进行这种对话。

绝大多数国家一定很高兴地看到今天大家非常关心发展中国家的命运。

今天，我们终于有机会把这个问题列为全世界优先事项中最优先的事项。

阿尔及利亚希望本届大会开会的结果，不负世界必须完成的巨大任务，于是，这里完成的工作，便将成为国际关系过程中一个决定性的转机。

毫无疑问地，某些国家目前的情况在每一方面都已经很可怕，而因为它们进口的各种产品几乎都是同时涨价，结果这种情况必定恶化。小麦的价格从一九七二年七月到一九七三年七月增加一倍，在一九七三年下半年又几乎增加一倍。糖价在不到三年之内增到四倍。

发展中国家最常用的肥料的价格，从一九七二年六月到一九七三年九月几乎增加一倍，这些过分的涨价都是控制全世界肥料生产十分之九以上的工业国家一手造成的。我们还需要强调进口谷类以小麦和米为主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这些产品的费用增加，今年的支出要比一九七一年增加七十亿美元以上吗？

固然，几十年来始终售价很低的石油，最近经过重新调整后，其目前价值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次调整引起工业国家激烈的反应，它们动员本国一切宣传和欺骗的工具，企图歪曲这个问题的基本真相。

但是，事实上，肥料和小麦涨价所引起的反应，与石油涨价所引起的反应，大不相同，这种基本差别的理由是：第一个情况下涨价所得的利润归于发达国家，第二个情况下涨价所得的利润归于发展中国家。

我们还需要指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进口结构中，粮食产品和肥料的一项支

出，几乎等于石油支出的两倍吗？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指出就联合国列入最不发达国家一类的二十五个国家来说，粮食产品涨价对它们收支差额的影响，比石油涨价的影响大百分之七十吗？

最后，单单以造成非洲萨赫勒各地区成千成万人民死亡的旱灾来说，我们可以指出：这些地区只要得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属各国每年用来饲养牲畜的小麦总量的二十分之一，便足够解决小麦方面的需要。

比较贫穷的国家，还要付出工业国家向它们提供机器、制成品、其他产品和服务的代价。单单举出发展方面占有重要地位的几种产品为例，过去五年内，钢的价格涨了三倍，水泥的价格涨了四倍，木材的价格涨了两倍半，拖拉机的价格涨了两倍。

此外，还有在发展中国家拥有生产工具或经营出口贸易的外国公司，把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移出国外。

在一九六〇——一九七〇发展十年的后半期，单单在各个公司申报盈利一栏之下，流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便达到二百三十亿美元之多，等于这些公司所属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正宗外援（即赠款）总额的一倍半。

最后，还有发展中国家欠工业国家总共八百亿美元左右的债务。这种债务在今年必须偿还的数额达九十亿美元，这是迫使发展中国家继续不断借贷，因而使它们的国际收支状况更加长期恶化的若干因素之一。

这几个事实说明了我们应该采取那种行动路线，以便具体地、明确地打开一条路子来解决我们所关心的基本问题——发展问题——的方法。

为达成此项目标而采取的行动必须属于一个普遍适用于某些基本问题的战略范围之内，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实将促成一种增长过程的开始和加速，使各国走上发展的真正途径。

我们认为如果要使这个战略确有成功的机会，那就必须以下列的指导方针为根据：

(1) 发展中国家必须收复它们的自然资源，这一点在基本上意味着它们资源的开采国有化，及对于定价机构的控制；

(2) 必须发动一项有条理的一体化发展程序，特别包括发展所有农业潜力，并且尽可能主要在每个有关国家自然资源——矿物或农业——的当地加工制造的基础上达成深入的工业化；

(3) 国际大家庭的援助主要基于富饶的发达国家对那些需要促进发展的国家提供的财务、技术和商业援助，必须以一种大规模地表示各国人民团结一致的方式来加以动员；

(4) 必须消除或者至少减轻发展中国家的沉重负担和困难处境，因为这些负担和处境往往根本打消了这些国家为求发展而作的努力和牺牲的成果；

(5) 必须制定一项特别计划，付诸实施，以便为联合国大家庭所公认的最困苦人民取得更集中的援助。

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开发手段的国有化，必须包括：接办这些资源的开发工作和管制它们的国外推销。

当然，我们之中的每一个国家都要作出它自己的经济和社会抉择；因此，阿尔及利亚认为尽管我们的政治方向不同，我们不应将国有化视为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抉择问题，而应首先地、重要地将它看作解放的手段，其目的主要是将自然资源从外国统治下解放出来，置于国家管制之下，从而使它们的开发具有国家性。

归根结底的说，原料国有化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先决条件。 国有化将使我们能够把我们由于开发自然资源而产生的资金流动保留在我们的国家之内；将使我们有机会让这些资源在我们国家内开花结果从而促进发展；而且将使我们的矿山和种植园同我们的经济系统重新结合，因此国有化将使我们立刻得到可以用于发展的新资源。 由此看来，国有化确是一种可使我们更容易地走上经济起飞过程的手段。

此外，国有化本身就是一项发展行动。 国有化使我们面对复杂的工业操作的各种现实和责任，因此也就替我们创造了条件来取得实际的管理经验。 它并且拆毁了外国公司在我们——生产者——和我们的顾客及供应者之间的壁垒，使我们立刻在国际关系上发生作用。 这样，发展的愿望就促成了发展的要求，也就促成了导致发展的行动。

根据各国人民对其自然资源享有永久主权的原则，联合国曾经正式地、庄严地宣布和承认国有化的权利。西方国家应该承认和接受由于行使这种权利而产生的后果，把它视作现代国际关系新发展所导致的各项改变的一个固有事实。因此，国有化越来越广泛地被认为是国家一级上自力更生的一项措施，是国际关系上的一个进展来源，只要它开展了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间互惠合作的途径，使后者从而接受由剥削关系走向平等关系的转变。

虽然如此，经验证明：承认和宣布国有化权利是不够的。毫无疑问，第三世界国家采取的国有化措施往往遇到私人利益方面的蛮横行为和若干政府的敌视态度，它们在第三世界国家实际执行这些措施的时候就运用它们的经济和商业势力，多方作梗，从事反对。

因此，联合国有责任作出必要的决定、采取必要的步骤，使这种权利不但不会停留在理论阶段，而且得由第三世界国家加以有效行使。为此目的，我们应该交付联合国一项任务，就是保证可能实行国有化的发展中国家在经营和销售方面获得其所可能需要的一切业务援助。凡为保持这种经济侵略新方式而使用武力或经济力量，意图破坏、阻挠和挫折国有化主权的有效行使者，不论其为政府或企业，大会均应严加谴责。

此外，我们之中许多国家到目前已经取得的经验使我们警惕到一项危险，就是如果我们被人骗去了收入，国有化的效果肯定就会减低，甚至完全遭到抹杀，所以国有化的主要目标是要通过对价格的操纵，恢复我们的收入。因此我们认为订定价格和控制有关机构的权力，乃是走向收回自然资源那个目标的必然推论，也是国有化的必要延伸。

不过，国有化固然可以用国家的行动来完成，但是如果生产国没有从它们的共同利益出发联合起来，在团结的基础上取得一个策略，对价格的控制就无从实现。

因此，为了恢复我们应得的收入，我们必须在每一种产品上，组成输出国的共同阵线，使我们能够集体地捍卫我们的权利，能够按照我们的利益和协调发展世界经济的需要，将我们产品的价格定在适当的水平。这个大会必须处理这个问题，并且要朝着实质地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原料定价来工作。这样会使发展中国家能够收回它们应得的款项和改善它们的收入。难道我们还需要提一下，仅是将十多种发展中国家输出原料价格的购买力恢复到六〇年代初期的水平，就会为这些发展中国家带来等于发达国家在一九七二年供给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的三、四倍的资源吗？

然而，发展并不仅是寻找方法，尽量提高出售原料的出口收入的事情。事实上，这应该只是维持和加快发展的一种手段，而发展实际上是要动员一切农业潜力和进行工业化，特别是尽可能在当地处理原料。

几乎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里，农业仍然是大部分人民所从事的活动，而且这种情形无疑地还要持续一段很长的时期。况且，在我们未来的计划中，我们仍然必须预期从农业方面取得大部分的粮食。所以，无论我们在经济政策上作何抉择，无论其他发展因素可提供的选择为何，充分发挥我们的农业潜力绝对必须是我们发展政策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而且就我们粮食方面的需要而言，必须要尽可能达到自给自足。

关于工业化，到目前为止国际发展方面各专家所崇奉的哲学都基于一种假设，那就是：发展中国家生产因素的生产力低，所以它们应该延迟进入工业时代——如果不是永远不进入的话。据说这种哲学不是基于关心妥善的管理，便是基于寻求集体的最佳条件，因此按这种哲学说，我们这些国家应当等到我们的资本利得率能够比得上发达国家的资本利得率，和我们的大批工人受有高深训练取得先进技能的时候。

最后，除这些因素外，我们的市场也是很有限的，据说是太狭小了，不足以建立各种端赖高度生产力的基本工业。所以我们必须等到我们的市场发展起来后再进入工业时代。这么一来，我们的国家就陷于停滞状态和等着瞧政策的恶性循环之中，势必被迫接受不公平的国际分工，而这种分工又把我们困在生产转变过程中的一个边际地位，换句话说，在这一阶段的过程里价值根本不增加或不足以偿付生产的因素。

我们的人民如果不工业化，那就应当心甘情愿地实行一系列的表面上的转变，例如装配、车衣或包装工业，可是这些工作对他们劳动力来说只是一种新的剥削形式，并且还进一步剥夺他们经济上创造和促进职业的真正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只有在真正的工业化里才会存在。

所以，我们这些民族就注定要让我们的人力资源不断地受到剥削和榨取，这不只限于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甚至在发达国家中也是如此。在发达国家里，移民工人现在已构成当地次无产阶级的大部分。而他们自己的国家里的长期停滞又剥夺了科技人员的升迁和发展的机会，因此他们也被发达国家吸收和引诱去了。

所有这些考虑使我们在阿尔及利亚的人断定，从事发展的惟一途径，就是否定这种思想。

在我国，我们信赖人民，相信我们的坚毅努力，我们建立工厂，不是根据自命发展专家用计算数字所表现的现有市场，而是根据我们的发展所将产生的或呈现的巨大潜在需要。

我们有决心达成工业化，我们已用大家的储蓄向我们的工业结构提供了经费，这种储蓄是通过个人和各级政府履行节约政策而累积起来的。

我们的工人和管理员必须就我们的发展每天都需要的投资和管理决定作出不断的努力；在作出这种努力的时候，越来越表现出他们在工业活动上或生产费用方面的干练，专门训练，技术和经验。

发展的障碍并不是一定取决于地理或社会学理，而是发展不足的结果。经验告诉我们，这些障碍随着投资的影响而逐渐消逝。正是由于长久停滞不进的恶性循环这个道理才产生了发展不足的辩证：与其等到障碍消失或减少，才着手发展，不如就开始发展行动，这等于用发展来扫除障碍。

一些不久以前还被看作主要是农业国的国家，通过加紧工业化，工业整体化，节俭和自力更生的政策得到了种种成功，这已经清楚地表明，只有甘心受困于发展不足的恶性循环的人才会遭遇到这种循环。

安排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暗示着建立一种真正的基础工业，利用所有的生产，管理和推销技术，逐渐地克服阻挠经济发展的一切障碍。如果在作这种努力的时候，有足够广泛的基础，和有必要的决心，便可为我们的人民打开门径，来创造增加的价值，在质和量上取得更公允的一份国际贸易，终而进入一向对他们关闭门户的技术和工业世界。最后就把他们带到工业革命里去。

这种工业革命是第三世界每一个国家所必须努力追求的一种必要的和迫切的目标。这项任务不能请别人来作。换一句话说，如果每一个国家要真正掌握他自己的命运，就必须自己负起本国发展的责任：这暗示着，首先最要紧的，是动员它的一切人力和物力。

在这方面，今天还没有特殊收入来源的国家，有很多都在它们的边界以内保有维持生活和保障将来的一切必要条件，他们可以开采他们的原料，也可以妥善地使用人力和农业资源，这一切本来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要最适当地运用这些资源，暗示着，作为首先的一项推论，那些没有优先性的或者无益的花费都应从私人 and 公共消费中剔除。就添置各种军备的倾国荡产的开销来说，更是这样——如果不是象面临侵略或军事侵略威胁的国家的情形，正当防卫国家主权和安全并不需要这些话。

最适当地运用资源也需要更公平地分配发展的利益，这就是说，消除任何类型的社会不平等或不均衡。不然的话，在所得的那一种增长之下，发展并没有内容，实际上也不会有进步。

很明白的是，发展是一条道路。要认真从事发展，必须自己动手，也就是说，要有决心，努力和牺牲，而且要有有系统地和明智地运用自己的一切长处和能力的技巧。但是，也很明白，第三世界各国的努力，不论多大而且多有价值，如果得不到国际大家庭，特别是各发达国家必须向它们提供的支援和协助，那么在巨大的发展需要之下，这些努力还是不够的。

在这方面，应该指出，到现在联合国通过它的各个专门机构所采取的主动措施，并没有达到为了援助各发展中国家在其国内促进不仅是表面改变的工业化所必须要作的地步。本届大会因此必须研究种种方法和途径，使各发展中国家得到私人资本一贯拒绝给它们的协助，因为私人资本不希望看到在发达地区以外有新的工业中心出现。

发达国家也应当对于每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获得发展、或者，换句话说，它的进入现代世界所代表的迫切需要感到关切，这种需要的基本理由有两个。这种需要的第一个理由是为公平和世界和平；第二个理由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将促成不断增加的需求，造成供发达国家利用的市场的大量扩展。

因此，各工业化国家必须接受一件事实，即发展中国家应恢复它们的合法权利和得到它们所应得的一切。

这就需要 对发展中国家的原料付给公平的价格，且也暗示保护这些价款的购买力使它不受通货膨胀及国际货币制度作用本来具有的一切不稳和不安定的影响。

通货膨胀是一个完全发生在发达国家经济里的现象，所以将通货膨胀的恶化归罪于石油价格的上涨显然是不可原谅的。

石油价格对于整个成本结构的影响一向小得不可置信；今天仍旧还是这样；因此，如果我们要制止通货膨胀，便须打击几项最重大的支出。

一般说来，发达经济普遍的浪费必须消除，特别是需要消除消费过度和工具花样化的现象。

同时还必须终止同人类需要或同发达国家人民福利不相干的毁灭性的支出。对于武器竞赛和武装侵略所造成的支出以及用于各种空间方案的支出，也是一样。对

于以往几年所推动的并且石油输出国组织作出的决定只有使它们加速的那些庞大的工程计划所耗费的大笔款额也应该这样。在那些认为经济依赖必须一直仍旧是单方向途径的人们的心目中、这些计划的惟一目的是要用其他石油来源或其他方式的能源来代替第三世界国家的石油。

目前国际货币制度作用的方法不但危害世界商业的扩张，并且特别阻挠第三世界各国谋求克服发展不足的一切尝试。

这种制度应该加以保护使它不受到扰乱，这种扰乱不但是将其货币充作准备货币的国家的片面决定所造成，而且也是不能或不愿控制其通货膨胀及国内货币混乱状况的那些发达国家的行为所造成的。所以须由这些现象的发源国来接受它们的责任及消除这种情况。

国际货币制度的改革必须基于需要使第三世界各国有权在民主的基准上参加改革的概念和工作。

关于这一点，大家无法接受已在世界各地流传很久的主张作为有效的解决办法。这种主张是要使人相信一种想法，即认为通货膨胀的控制和国际货币制度的稳定都需要不恢复原料价格的货币价值。

此外，世界扩展情况的远景是：这种扩展的极大部份可以由发展中国家来实施而完全无损于发达国家的利益。

拿钢铁作为惟一的例子来说，根据足以代表全世界最大钢铁生产者的负责人所作的估计，从现在到一九八五年为止，世界消费的需求将需要装置每年能够生产钢铁五亿公吨以上的新设备。因此，岂不是有合法理由应在优先的基础上将计划设置的钢铁生产设备的合理的一部份设在出产铁矿的国家里吗？

对于供发展用的财政援助的定义和使用的标准，需要再加以彻底的审查。

只有确认发展中国家的优先需要及在完全收回它们应得的一份之后评定了它们的资源需要的基础上，外援才有意义，才有建设性。

要避免重踏在前一发展十年中遭到的失败，外援的数额比以前必须有相当大的增加，同时要有保障，不受不能预见的事件的影响，因为在前一时期内，这类事件经常把外援削减，结果是把外援的实值削去了百分之四十。

另一方面，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应该把外援当作发展的根本工具，而且根据这个观点，也不应该单纯地以它来代替每个国家为了克服落后状况而作的、以自己的人力 and 自然资源为本的努力和牺牲。

同理，如果在社会不平仍旧保留的情形下给予外援，如果不优先为条件最差的群众作改善命运的服务，这种援助将丧失一切意义，因为外援的本来原因是要把过剩的财富重新分配，以补偿在自然或历史方面固有的不平现象，改正存在于国际层次上的差异。

此外，为了不要加深较贫穷国家在国际收支方面的负担，外援应该包括较大的不须偿还部分。在这方面，对发展中国家在目前的负债问题加以审查，是十分需要的。在审查时，有多项债务应该考虑撤消，其他的则应该在到期日期、延期及利率等问题上考虑给予较好的条件。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外援一定不能再通过这样的途径来分发：这种途径使外援看来好象是为了买得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同盟而付出的，因此使它变得可疑、无效。供发展用的援助尤其不应该附有任何条件，在外援的存在和维持极低价格的原料两件事之间造成联系。今日许多工业化国家已经承认有这种联系，但也不过等于承认，外援只是在拿走了较贫穷国家的资源之后，给它们的一点最低限度的补偿而已。

最后，如果真的要使外援从较富有的国家无条件地交给较贫穷的国家，那么每个国际大家庭的成员所分担的一份，就必须根据它的实际财富而定，也就是说，根据它的发展程度而定。发达国家掌握了世界上大部分的财富，因此也应该提供大部分的外援。

阿尔及利亚作为第三世界一个成员，宣布它决心要对国际互助作出自己的贡献；须知在我们的眼光中，外援的定义是最富的对最穷的或一无所有的作出的一种贡献。我们规划好的尽力发展的强度意味着我们依然面临了国际收支问题，我们不断被迫着去借贷，尽管我们已经极力施行了节约。然而，阿尔及利亚还是要象过去一样，准备作出必要的牺牲，以表明它坚决打算履行其国际团结的责任。

我们应该在这一团结的前提下来评价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在阿尔及尔开会的各个阿拉伯国家首脑、在拉合尔的各伊斯兰国家和石油输出国组织各成员国最近作出的倡议。

最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正在经历结构性的困难，发觉它们自己目前正处在特别严重的局势当中；因为它们没有必要的财力来支付最需要的产品，也不能支付它们需要用来进行其经济活动或发展工作的货物。

因为问题是要让许多处在无望的赤贫状态中的国家有机会从它们的贫困中脱身出来，并希望有一天加入进步的行列中去，所以国际大家庭之要决定制定一个惠及这些国家的特别纲领——一个有明定的施行时期和精确的目标的纲领是绝对迫切必要的。这个纲领应该能够以特别优惠的条件来满足最困穷国家的最低限度和最重要的需要，就是它们对最必需的物品的需求，类如食品、动力、药品、

肥料、生产设备和劳务等，甚至在某些情形下要无偿给予。同时，这个特别纲领必须能够给这些国家以例外的用于短期发展的财政援助。这种援助最好出以无偿捐款的形式，至少大部份是这样。供应这个纲领所列产品的财务负担可以由各生产国按照它们在这个部门的生产能力的比例来挑起。支付这个纲领所列生产设备和劳务所必须的资金可以由国际大家庭的各国政府按照其各自收入的比例，作出捐款来保证供给。因此，各工业国家和有剩余资源可供支配的发展中国家要起特别重要的作用。为要迅速有效地行动，国际银行和亚非拉各区域银行可以在起初一面在适当的监督下开始管理在这个特别纲领的范围内立刻动员起来的基金，一面等待设立受托永久管理这些基金的机关。很明显，还可以提议以其他的形式供给资金；最重要的是目标和必要的手段都有清楚的规定。

我国就要提出一个有关这个特别纲领的提议。我希望大会把它作为一个具体直接的措施通过，成为联合国本届特别会议可以引以自豪的成果之一。

我们刚才提议的战略意指国际大家庭将同意从根本上改正指定对减少国际差异的目的来说显得不够的增长率那种作法。最发达国家中的个人收入达到每年三千至四千美元而最穷的国家中每年个人收入只有一百至二百美元，声称要减少两者的差异，而又建议只会给最穷的国家每年百分之五的增长率的措施，实在是一件从一开始就显明注定要失败的事情。

现代交通工具已把世界大为缩小，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不能再让这种不平等和这种剥削继续下去，就象过去一国之内不容许有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一样。

第三世界国家事实上不能把这个排斥它们和否定它们的世界的成功增长和技术看作是自已的，这种增长和技术的发展同它们无关并且大半是不利于它们的。

一九七四年每日个人收入还不到三分之一美元，从第二个发展十年的预期结果似乎可以看出，一九八〇年的收入也才等于半个美元，联合国大家庭若是强调它决心结束本世纪再也不能容忍的这种事情，它将在国际经济关系上开辟一个新纪元。

比较贫穷的国家的需要是营养、学校、医院和向不发达情况展开斗争的手段。另一方面，富有国家的需要不但是无止境地增加它们的财富，而且是为了政治与声威的目的不断作出毁灭性的花费。在这两种需要之间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那些需要要为别的需要作出牺牲呢？因此，原料问题其实是针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互相对立的优先需要而提出来的，也是针对与这种对立情况有关，为了满足这些优先需要应如何分配世界资源而提出来的。

工业国家企图累积最大的利润，以便能尽快不再需要发展中国家的原料。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希望从这个已清楚地送给它们的最后通牒得到好处，为它们的发展和解放奠下基础。事实上，在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现在开始的竞赛中，原料问题已不能单纯从商业的角度来理解。原料问题展示出一个道道地地的战略问题的所有方面。这个战略问题将决定生产国家的存亡，所以必须给予最坚决的警戒。

今天，第三世界国家了解可以让它们踏上发展与进步的道路的条件；而且，第三世界国家不能不知道如果它们不掌握现在的机会，参加战斗，为它们的幸福作出努力和牺牲，它们的前途一定是黑暗的。

对发达国家来说，问题是它们能不能了解它们的将来是不能与第三世界人民的前途割裂开来的。如果它们真的了解的话，它们就应该承担起这种理解所暗示它们要负的责任。尤其是，由于他们目前控制了经济权势的操纵棒，作为维持和平的一个条件，作为对进步的一个贡献，它们必须接受发展中国家重新获得并承担起它们在世界经济活动上所应得的那一份合法的领导和管理权力。换句话说，它们必须接受第三世界人民经济解放的条件，它们必须同意为了第三世界人民的经济解放而需要改变目前的世界经济秩序。

如果这个大会的辩论与决定能使我们有望获得这样的一个成果，那么第三世界人民的发展以及对贫穷、疾病、文盲和不安全所取得的胜利将不会是穷国对富国的报复，而是全人类的一大胜利。

主席：我万分荣幸地代表大会，向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阁下，对他的重要讲话，表示深深的感谢。

维尼斯先生（阿根廷）：阿根廷政府一开始就热烈支持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布迈丁主席提出召开大会特别会议的倡议。我们参加这个会议是因为我们深信议程中所列的这个议题极具重要性和影响力，而且深信对于民族意志运用的需要愈来愈形迫切，以期创立一个普遍的合作制度，订立共同生存的规律，使各民族间的关系更趋公平更趋合理。

主席先生，我们很高兴再度看到你担任大会主席之职，使这个职位有很高的威望。相信在你的主持下，会议能有很大的成就。

影响这个时代的是改变和互相依存这两因素。今天的根本问题并不是辩论应不应当改变，因为改变是无法避免的。互相依存这个问题也不是看是否有一种静止的状态存在，因为我们相信互相依存的程度只会不断加深。我们所要规定的是改变的路线，并必须预见在广泛的原料和发展领域中进一步互相依存能发生的作用。换句话说，为了这方面的国际共存，我们必须阐明和选择所应遵守的规则。这就是我们这次会议议程的中心议题。

阿根廷政府认为我们大部份努力的方向应当是确保公共舆论和各发达国家政府对于目前局势的原始起因以及这些政府应负的责任获得一个清楚的概念，并使它们也接受必须与发展中国家建立新关系的这种概念，并在这方面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同时这种新关系的建立一定要以彻头彻尾修改现有的行为规则为根据。

如果我们可拿果实来断定一枝树的性质，那么经济方面的国际共存的规律也能以眼前的情况来作一定论。那么事实上这种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们除了引用一九七三年九月《阿尔及利亚宣言》以外没有其他办法，《宣言》说：

“发展中世界拥有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但是只靠全世界收入的百分之三十来维持生计。

“在发展中世界二十六亿人口中，有八亿人是文盲，差不多十亿人患营养不良或挨饿，有九亿人每天的收入不到三十美分。

“根据这一切考虑，直到一九八〇年的估计不能不非常悲观。

“假设第二个发展十年所定的目标能够实现（这一点不能肯定），发展中国家的国民总收入只会增加八十五美元，而工业化国家则为一千二百美元。

“到目前这一个十年结束时，平均每年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收入在发达国家将是三千六百美元，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将只有二百六十五美元。

如今数亿人口由于出生地关系，被迫每年平均只能拿到265美元，而别人却能拿到3,600美元。如果让这种制度不断延续下去，非但不公平而且也是无法接受的。

庇隆总统说过，一开始人类就受历史决定论的控制。但世界的现实政治不断涌现出种种特征，能长期作为解释和理解这种情况的尺度。

可以从各国参加世界实际事务日益踊跃这一点上看出，互相依存的概念同各民族和国家生活的种种方面的关系一天比一天密切。假设这种关系的基础是公平不偏的，那末大家一定会相互合作，但如果建立关系的目的是要干涉决策程序，那就免不了造成一种先是家长作风后来变为霸权主义再变为统治的现象，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帝国主义的表征。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历史上的短见。

今天还有一种特别现象，就是在所有阶层上，有愈来愈大的趋势让受影响最深的人民，对足以影响他们的政治决定，大胆表示意见。因此，那些程序就变得愈来愈复杂。各方面踊跃参加的趋向已成了今天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正常的特征。只要读一读阿尔及利亚高峰会议的《宣言》就能对我们各处人民所关切的主要问题得到一个清楚的概念。这个《宣言》特别指出各国政府愈来愈意识到一般人民所抱的愿望，这种愿望就是人民要体验到在作出有关其命运的决定中他们是参加有份的，如果是创立一种世界性的制度而对于这种制度的保卫和改善对他们直接有关，那么他们也要觉得自己也是起了作用的一员。只要根据现存行为规则的制度存在一天，他们的愿望就一天无法满足。

各国间日有增进的互相依存以及政治上滔滔雄辩所造成的使各国政治观点更形接近的共同点也会不断增加。但是这种情况免不了造成各重大领域的摩擦和冲突。

在目前现实情况中，另一极为重要的特征是认识到如要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利用现有的机会，不能完全根据自己国家的路线。各国现在自己想解决的问题是只能在国家大集团的范围内来加以辨认、讨论和求达解决的。

由于没有一种普及世界的能起作用的共同立场，所以使发达国家区域或发展中国家区域两者都面对一种历史性的时刻。但是，似乎矛盾的是，重申国格和在政治上表现国格事实上确使各国能在组成集团时更紧密地一起行动。这种态度和这种行动确使各国注意到个别国家所有的利益。在我们这一区，拉丁美洲团结的概念使各成员国更紧密地结合在一道，在与第三者有所折冲时使各成员国能更灵活地互相合作，但是这项概念现在却同国家利益的概念混为一谈。今天拉丁美洲政府往往对别国的问题感到关切，如果这种问题的影响是涉及整个区域的话并且对这种问题正如对影响到我们自己本国的问题一样关切。

各区域更密切的政治结合对那些正在从目前这个互相依存的制度里面得益的人来说是有莫大的关系的。如果他们不准备有效地对国际社会正义有所贡献，他们是有理由关心的，因为区域化开辟了在那种情况下一定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冲突局面的潜在可能，并且会发现，那些今天因不利的比赛规则的使用而受害的国家愈来愈团结一致。阿根廷政府深信，发达国家不会能够以试图避免或破坏区域性组织来寻得真正的解决办法。发达国家自己的政治性行动树立了一个榜样。它们事实上控制着一切它们能够控制的：它们的市场、货物、劳务、资金流通、它们产品的国际性供应等，一句话说，一切可能符合其利益的。因此，当发展中国家执行相同的控制并表示决心不在任何压力下屈服时，它们不应该惊诧。

在一个多元意识形态一般被完全接纳的世界上，以一国采用的经济社会制度为基础而实行差别待遇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我们认为，国际贸易安排在其基本原则内因为这类理由而没有明确地提及无差别待遇的都是过时了的。

在我们的半球里，我们注意到在已经基本上全面改观了的环境里，还有一个反常的局势。我指的是由于在区域组织的范围内通过的区域性制裁，古巴共和国姐妹还在遭受差别待遇。

阿根廷政府相信，对多数拉美国家来说这种制裁已经成了老古董；这些国家现在拥护这样的立场：在当今的情况下，这种制裁既不合宜又是不幸的。因此，应该清扫同古巴人民恢复一切种类关系的道路，使这个区域体系内想这样做的国家可以不受不正当的束缚，恢复这些关系；这些束缚在政治上帮助造成了区域组织内的停滞状态，而这种制裁又原来是在该组织的范围内决定的。

这是各国应该多衡量当前的形势和将来的展望，而少受过去经验的束缚的时候了。我们时代深刻急剧的社会、经济、技术和政治转变给分析本届会议要讨论的实际事情带来了新的尺度。本届会议要规定新的国际行动方式，好让我们打破从前管束而现在还在管束着世界贸易的古旧结构的框框。

最近的、特别是起因于石油产品的价格和供应的能源危机已突出了一个事实，

即，当发展中国家一致行动，并决心挽回其合法利益时，我们这些国家对于各大工业中心在生产销售原料方面的政策和决定的那种从属地位就可以倒转过来。

在国际事务上吸引了那么多注意力的有效的互相依存，到现在为止只有在大的世界经济中心之间得到尊重；因此，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即，第三世界国家团结起来，保卫其国外资源的来源；在为得到并有助于其利益的任何时间和适当场所谈判；或者，当它们的论点必须克服误解的障碍的时候，就象石油出产国已经做了的一样，采取单方面行动。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无法克服它们没有参加的货币决定的时候，发达国家决定的保护贸易政策和条例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某些原料进入世界市场。我不想在这个时候详细谈论类如欧洲共同市场在进口牛肉问题方面所采取的政策等的具体案例，因为我们有时间在同一届会议里面的其他会议这样做。我只要强调，这类政策所代表的闭关主义概念反映出在原料方面国际合作的减弱。

但是我们这次参加并不限于只说出自己的问题。我们虚心地来到这里，要寻求解决世界性或部门性问题的共同办法，好使我们能够开辟解决当前和将来的问题的道路。我们相信对方也将采取相同的态度。结果会告诉我们，我们怀抱这种希望。是对还是错。

我国政府觉得，基本的国际行动纲领就是从不结盟国家阿尔及尔宣言发源的那一个。要在本届特别会议中促进这个宣言的解释和执行，我们就必须编制一份直接的行动纲领，抱了建设性的目的，来充分利用现在就有的机会。

以为不结盟国家阿尔及尔纲领或者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第三届贸发会议的政纲的利马宣言的目标，在本届会议就能得到充分实现，我们认为未免不合实际的。不管我们能得到什么成就，发达国家的政治意志和这些国家舆论的不断支持将是决定性的因素。

还有，发达国家必须明白和同意，本届特别会议必须得到建设性的实质进展，

因为不是这样的话情况可能会严重恶化，尤其是要记住，已有的对抗并非发展中国家惹起的。

石油危机使全世界集中注意力于我曾提到的现象和特征：互相依存；各国愈来愈决心以政治意志来矫正不能用传统方式矫正的局面；国家结为集团采取一致行动；冲突局面激增；意识形态的无差别待遇；和尤其是因国家间相互关系所引起的脆弱性等。

我国政府认为这就是一个适当的起步点，这不但是为了将来的长期努力，同时也是为了现在就试行确定一种纲领，使我们的工作和我们在这一届大会中所付出的努力可以有连贯。我们要参加这次会议，使那种引导力量能够从我们的辩论中产生出来，同时，使我们从这次会议领会到一种新精神和决心。

响应这个中心思想而提议的措施，必须殊途同归，而且一定要看这是贸易的问题、财政或科技的问题、或从合作与援助而产生的问题，在不同的论坛上予以通过，但是，它们必须符合发展落后国家的全球性观念，有助于减少它们与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差距。

正如全体的经济和环境安全一样，全盘发展必然是这种新关系的主要观念之一。如果同意将这个观念视为最优先的，那么，就要界定一种可以使行为规则起实质改变的基本哲学，否则，国际关系——常常是不平等的——就不能有稳定和持久的意义。

为促进发展而合作的观念与稳定或组织市场的观念结合起来，将使有关原料的协议加上新的意义，表现一种新的行动哲学。因此，多边贸易谈判的范围及能够促使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结构也就会扩大。

合理地利用这种富有生命力的发展观念，可以为更公道的共存关系的许多方面带来和谐的效果。简单地说，它可以使大家都获益。同时也要求大家都作出努力，从而就可使发展中国家一同来支持、保卫和改进这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但是，单是签署协定或是筹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方案实质上还没有实现国际合作。它还需要发达国家在确定其国内和外交政策、尤其是在贸易与财政

范围内的政策时，照顾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样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就不会受到不利影响，反而受到鼓励与支持。我们最重视发达国家对那些巨大的跨国企业的态度，因为这些企业的活动常常破坏各国的合法利益，干涉其国内事务、甚或制造足以打破正常国际关系的变动。

广泛而彻底的改变为国际共存的基础的行为规则是今天最重大的急务。我们生存于一个瞬息变化、越来越互相依赖，负有改善目前与将来关系的政治使命的时代。我们所预见的冲突是很重大的挑战，但是，它也为人类带来极好的机会。我们主要的局限只是缺乏勇气和想象力。阿根廷总统胡安·多明戈·庇隆将军曾指出，现今迫切的需要是人类的思想革命、尤其较高度工业化国家领导人的思想革命。他又说整个世界的社会与生产结构的改变——尤其拥有高度技术、具有市场经济的国家——和人与人之间以至人与自然之间的生物共存关系的复活也是需要的。

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不结盟国家从来就是而且将继续是这种变化的先锋。如果我们大家都作好准备，能够接受目前的挑战并作出共同的、不断的努力，这些变化便会发生。阿根廷共和国既对达成拉丁美洲的一体化抱有决心，保证必定坚决努力，以期我们的区域能为建立一个以团结及国际社会正义为基础的新的经济秩序作出贡献。

主席：谢谢阿根廷共和国外交部长所作的重要讲演和他对我所说的亲切的话。同时，他在开始讲演时曾受干扰，我谨向他致歉。

我要求所有出席的代表团充分合作，以避免代表对大会发言时受到干扰的事件再度发生。为了避免过道间的宣扰，我将执行当时情形所需要的措施，甚至是最严厉的措施，在这方面我将对警卫人员发出明确的指示。

在会议休会前，我谨宣布一般辩论的发言者名单准备在四月十二日星期五下午六时截止登记，我想把这个问题交给大会今天下午的会议来审议。

我同时建议，依照从前各届会议所定先例，行使答辩权时的发言以十分钟为限，而此类发言一般将在当天下午会议结束前进行。如果无人反对，即如此决定。

决定如议。

下午一时散会。